

新世纪 农民工书写研究

XINSHIJI NONGMINGONG SHUXIE YANJIU



江腊生 著



人民出版社

新世纪 农民工书写研究

XINSHIJI NONGMINGONG SHUXIE YANJIU



江腊生 著



责任编辑：马长虹

封面设计：肖 辉 孙文君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世纪农民工书写研究 / 江腊生著. —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8
ISBN 978-7-01-016398-7

I. ①新… II. ①江… III. ①民工—题材—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创作研究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47751 号

新世纪农民工书写研究

XINSHIJI NONGMINGONG SHUXIE YANJIU

江腊生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2016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16.5

字数：270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16398-7 定价：4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序

陈东有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农民工的研究成为社会学、经济学等社会学科的热门话题，原因首先不是研究者的主动，而是农民在谋求生存方式上出现了太多的问题，有太多的不平等，太多的艰难。社会科学工作者发现了这些问题，闯了进去，构建了“农民工学”，出现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为农民工的生存和发展，为农民工的维权，为中国社会的公正和平等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产生了很好的效果，这是有目共睹的。

但是农民工的生存不只是物质的问题，还有心灵的创伤需要医治，还有精神的需要应该得到满足。他们有话要说，有苦要诉，有情要抒，有喜要乐，有歌要唱，有故事要讲，还有一些有一定文化的农民工有事要写。“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在他们身上同样有强烈的表现，他们有人文追求，也需要得到社会的人文关怀，他们期待人文学科的学者去关注他们，关心他们。这是近十年来“农民工学”发展的又一个新的重要内容。

江腊生先生就是这样一位人文科学工作者，他不仅像其他社会科学工作者那样走进农民的劳动和生活之中，更走进了他们的精神生活之中，去体味他们的思想的波动，去把握他们的精神脉动，去研究他们的或写他们的文学创作。江先生对此的认识是很深刻的，对那些采用写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的农民工兄弟给予了亲切的人文关怀，同时也对写农民工的文学进行了

人文意义的研究。

农民工书写“热”，是当代文坛的一个重要现象。城乡二元体制的长期存在，引发了农民工强烈的不平等感，在精神构建和文化心理的深处发生了前所未有的矛盾冲突。其中的苦难、艰难、困惑、焦虑、压抑，更是记录了当下中国特定转型时代的生存事实。透过这些事实，呈现了一个农业大国迈向工业主导国家的艰难历程，体现了中国农民在厚重的乡土与现代化的城市之间的精神流变。在城乡冲突的时代语境下，文学承续了针砭现实的传统“悯农精神”，将农民工进城的事实作了最直接的描述，呈现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复杂状态。这些作品在一系列与民呐喊的不和谐音符中刺激了当下主流社会和读者的神经，为当下文坛赢得了真切的现场感和人道主义的力量，也显示了它的浅白与功利。

江腊生先生在他的研究中认为，在这些文学中，城市想象既是农民工走进城市的巨大驱动，也是作者对诸多现代性悖论的理解和把握。同时，作者立足于乡土世界，以乡土的价值尺度来观照城市的遭遇，并以贫穷化、诗意化的形式来反衬城市欲望的想象性书写。二者在农民工身上汇聚、冲突产生了农民工在特定时代的生存焦虑与价值焦虑，并形成了他们偏执型、情绪化的叙述伦理。从叙述模式来看，新世纪农民工书写直面底层，揭示城乡不公的社会现实，整个文学群落呈现出单一的模式化、情绪化特征。从创作心态来看，有两个角度，一是来自一线的打工青年之“我手写我口”，提供了鲜活的人生生活的经验，真实地记录了打工一族在现实生活中的血泪与悲欢，憧憬与希望，以及他们在乡村和城市的缝隙间穿梭游走，找不到归宿的孤独和苦闷。这些作者往往不平而鸣，更多的以一种梦想与愤激的心态来面对他们生存的世界。二是写农民工的作家们带着现实主义批判的精神和启蒙拯救的意识，观照农民进城的谋生艰难与人性审美，从而在文学陌生化的努力中获得了新的空间。

于是，关于“农民工文学”的研究和讨论就在这里展开了，这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进步。这里，注重的是以人的观念贯穿农民工书写研究，以文学焦虑切入文本，探讨其中的叙述心态和叙事模式，结合当下语境，探讨各种媒介对农民工书写的影响与发展，并以文学史的视野，辩证地审视其美学得失。这里，研究的问题意识强烈，关注社会现实问题，注重从

表现形式上分析农民工书写的美学得失，不仅在文学理论、美学表现方面对农民工作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又在视野上提升了当代文学的现实参与意识与责任意识。

关照一个庞大而又崭新的社会群体，不仅关心他们的吃穿住行、工资津贴、婚姻家庭这些基本权益的保障，还要关心他们喜怒哀乐、公正平等、嬉笑怒骂的精神需求，这也是他们的基本权益。有时我们不必区分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区别，因为二者是融合在一起的；有时我们又有必要区分他们的区别，因为二者不一样，不仅需要拷问我们有没有缺失，更需要社会各方面给予他们以整合、以全面的关照。

江腊生先生的研究为我们的文学当代研究做出了一个很好的样本。

2016年6月16日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1
第一节 课题的源起与农民工书写的提出	1
第二节 农民工书写的研究现状与特征	7
第三节 焦虑体验：文学阐释的一种理论基础	15
第四节 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17
第二章 农民工书写的兴起与美学传统	19
第一节 农民工书写的兴起	19
第二节 农民工书写的定位	24
第三节 农民工书写的美学传统	28
第三章 农民工书写的历史渊源	39
第一节 古典文学中的农民进城	39
第二节 现代文学中的农民进城	49
第三节 延安文艺精神与农民工书写	59
第四章 农民工书写的城乡想象	70
第一节 当下农民工书写的城市想象	70

第二节 农民工书写的乡土情结	82
第三节 城乡焦虑与文学伦理	96
第五章 农民工书写的叙述研究	105
第一节 农民工书写的叙述模式	105
第二节 当下农民工书写的想象性表述	114
第三节 农民工书写的叙述心态	124
第六章 打工作家的农民工书写	134
第一节 王十月：底层世界的身心挣扎与虚实叙事	134
第二节 王学忠：底层焦虑与抒情伦理	144
第三节 郑小琼：打工经验的见证与超越	154
第七章 主流作家的农民工书写	166
第一节 孙惠芬：在诗意中穿透民工生活经验	166
第二节 贾平凹：强作欢颜的高兴	177
第八章 文学媒介与农民工书写	186
第一节 网络文化与农民工书写的新走向	186
第二节 文学期刊与农民工书写的分化	195
第三节 农民工影视的文化符码及其话语构成	205
第九章 农民工书写的历史价值与美学缺失	217
第一节 农民工书写的历史价值	217
第二节 农民工书写的美学缺失	224
第十章 结 语	236
参考文献	248
后 记	252

第一章 绪 论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每一股文学思潮，几乎都是在社会转型的语境下产生。没有转型就没有现代文学的发生。“转型”首先是一种社会秩序的变动。城乡之间形成的巨大差距，导致大规模农村人口的流动，直接产生了“农民工”这一群体，也催生了“农民工书写”这一文学现象。“转型”也是一种社会心态。它体现了一个多世纪以来现代性之风给这块古老的土地带来的兴奋与焦虑。文学因为转型有了美学的张力。“转型”又是中国社会特定发展时段的抚慰剂，生活在其中的每一个中国人发现，几乎天天是转型，处处在转型，转型是一种艰难，也是一种希望。可以说，转型与“农民工”这个称谓一样，都是中国社会发展“在路上”的中间状态。“农民工”，是指离开乡村进入城市务工的农民群体，它意味着中国农民在特定的工业化进城中从乡村到城市划过的生命轨迹。他们在卷入城市化的过程中经历了种种遭遇，又努力寻求生存下去的希望与快乐，引发了强烈的错位感、失重感，在精神结构和文化心理的深处发生了前所未有的矛盾冲突。其中经历的苦难、困惑、焦虑和压抑，真实呈现了一个农业大国迈向工业主导国家的艰难历程。透过农民工的这些生存事实，体现了中国农民在厚重的乡土与现代化的城市之间的精神流变。

第一节 课题的源起与农民工书写的提出

出生在乡村，成长在乡村，如今谋职在喧闹都市的我，总感觉自己的一

半留在了老家，还生活在老家土木结构的屋子里。城市是我生活的现实空间，却总是让我屡屡产生一种客居他乡的感觉。每年的春节总要回到老家，与年迈的父母共叙一年的冷暖，一年的努力。每次回到老家发现，水泥钢筋的房子一天天在挤兑着原来的老宅，手机、电脑、摩托车、小汽车，不断武装了乡民的日常生活。然这些外在的生活表象，却无法掩饰父老乡民从乡村到城市的内在焦虑，也无法冲淡我本人内心的焦虑。候鸟式的农民过年之前飞回，年后又带上一年的行囊和依恋，匆匆飞向沿海城市边缘的各个角落。每次回家父母总有一些留守老人和儿童的真实故事传入我的耳中，谁家的孩子在外打工，挣了多少钱，谁一家人在外打工欠了一屁股债回来，谁家的孩子在外打工出了事故，谁家又造了新房子。这些话语当中直接促成了我对农民工群体的关注。加上我当年也曾有两个月的东莞打工的体验，一个月在皮鞋流水线工作，一个月从事企业文化工作，白天黑夜的轮番加班，上交了身份证后的无自由，相对内地中学教书的“高收入”，都让我无法忘怀当年“走四方”的冲动，和漂泊广东各市的苦与乐。因此，来自身体内部的乡村情结与曾经的打工体验，让我无法漠视家乡的打工“候鸟”，无法不去关注他们的生存状态和情绪体验。

其次，三年博士论文的研究，一直在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中寻求话语的自我建构，却发现这些研究似乎无法贴切阐释身边的很多文学现象和生活现象。博导朱栋霖先生提出的“人的观念”，让我将视角聚焦到中国当代文学的本土人格，中国社科院杨义先生的本土化思维，直接将我的研究拉回本土的文学事实。天然的农民情结与强烈的底层意识，让我逐渐意识到，在江西这块厚实的红土地上从事文学研究，就应该立足江西是一个农民工输出大省的事实，关注他们的文学诉求与情感世界，是寄予我关注农民生存、开辟我文学研究新领地的有效方式。这让我逐渐将研究视野移至农民工书写，通过考察这一类文学的情感流动与思维方式，从而真正把握当下中国最为本真的文化事实与文学努力。

切身的乡村生活体验和文学研究的冲动，驱使我不断将目光转向当下关于农民进城的文学现象。历史地看，农民进城谋生，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一个历史现象。在古代，农民离开乡村，往往成为游民，自由出入于乡村与城镇之间。王学泰指出：“他们脱离了社会秩序，失去了角色位置（许多游民

无妻无子),是没有根基、随着时势浮沉游荡的一群。”^①游民往往居无定所,也没有正常的职业,反社会和崇尚自由是他们的特征,进城谋生并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但是,他们的农民身份,他们的城市流动性与进城农民工相仿佛。一直到明末出现城市资本的萌芽以来,中国农民走进城市,成为产业工人的雏形。“工业化的最普遍的影响,就是农民大批的由乡村趋向都市去找寻工作。”^②20世纪50年代,柴德赓等人在苏州发现清朝雍正年间所立的《永禁机匠叫歇碑》,从碑名来看,“机匠”,即机织工人;“机户”,即作坊主;所谓“叫歇”,是苏州方言,即高喊停工的意思,当“罢工”这个词还没有出现的时候,在苏州丝织业行会的机房里,已经有机匠因为不满机户的剥削,要求提高工资改善待遇,而拍案高喊歇工。可见,农民进城务工在那时已是一种普遍现象。^③而在20世纪初,江苏无锡等地的织绸、面粉、铁工、印刷等行业的工人“本地人约占30%,近乡人约占21%,他省人约占43%。”^④如翟克指出,“中国农民缺乏耕地,因此一家之生活实不容易维持,幸而中国的农民的生活程度低下,而农民兼有副业,如织布、纺纱与养蚕都可以增加农民之收入,使他们得以维持其生活,但自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侵入中国农村后,就把中国农民的原有副业掠夺了,于是农民就入不敷出,则农民不能不求副业——当苦工——于都市,而把土地的耕作委之妻子父母,弄到结果,副业的苦力变成正业,正业之农耕变成副业,于是从前农业原有的和平安定之空气,为之一变,农村就无形中被破坏了。”^⑤这种情况在夏衍、丁玲、老舍、茅盾等作家那里得到了不同角度的反映。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为了集中最大化的财力用于工业发展,国家实行农业服务于工业化的城市化策略,尽可能控制城市规模的发展,并最大限度地降低城市化运营的社会成本。因此,限制农民流入城市,压低城市消费成为国家的主要措施。户籍制度成为城乡二元结构的主要壁垒。以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为依据,国内人

① 王学泰:《游民、游民文化与游民文学(上)》,《文史知识》1996年第11期。

② 陈翰笙:《工业化与无锡的农副业》,见陈翰笙、薛暮桥、冯和法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3辑,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年版,第157页。

③ 柴德赓:《记〈永禁机匠叫歇碑〉发现经过》,《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7期。

④ 池子华:《近代苏南农民工的源与流》,《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

⑤ 翟克:《中国农村问题之研究》,国立中山大学出版部1933年版,第119页。

口二分为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他们分别享受农业粮和商品粮，口粮制度正是户籍制度的基础。于是从生存上根本锁定了“农民”与“非农民”的身份，拒绝了城乡之间的合理流动。1952年，《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应劝阻农民盲目向城市流动》。1953年4月17日，政务院下达了《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首次以政府的名义阻止农民进城，提出对进城农民，除有工矿企业或建筑公司正式文件证明其为预约工或合同工者外，均不得开给介绍证件。对进城农民，除确实需要的，要劝其还乡。^①一直以来，农民进城处于各级政府的遏制之中。相反，“与使革命走向胜利的农民相比较，市民的特权地位不断增长。在城市里，由国家负责提供的‘一揽子福利’待遇，社会主义从而被认为是前途光明的；但是在农村，提供任何福利的负担，最终都不是落在国家而是落在集体和农民自己的身上。结果经济改善的情况比城市少得多。”^②实际上，为了进一步防止农村人口大量外流的现象继续发展，从1956年12月30日到1957年12月18日间，中央政府及有关部门连续发布了7个限制农民进城文件。它们分别是：1956年12月30日由国务院颁布的《关于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1957年3月2日由国务院颁布的《关于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补充指示》；1957年5月13日国务院批转内务部《关于受灾地区农民盲目外流情况和处理办法的报告》；1957年7月29日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实施阻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和削减城市人口工作所面临的问题及解决办法的报告》；1957年9月14日由国务院颁布的《关于防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通知》；1957年12月13日由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各单位从农村中招用临时工的暂行规定》；1957年12月18日由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制止农民盲目外流的指示》。^③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以超稳定的形式，将城乡居民的社会身份、户籍等方面作了严格的区分。

1978年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农民陆续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开始涌入城市寻找新的发展空间，在就业机会、公共服

① 龚育之主编：《中国二十世纪通鉴》第3册第11卷，线装书局2002年版，第3429—3430页。

② [美] R. 迈克法夸尔，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12页。

③ 王爱云：《试析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身份社会的形成及其影响》，《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12期。

务、生活消费等方面，与城市居民产生冲突。一些城市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仍将他们定位为“盲流”，采用收容、遣返等制度进行管理，产生了很多社会问题。但是，改革开放的全面铺开，决定了这次农民工流动的规模空前。流动迁徙的形式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跨地区流动，随着沿海地区工商业的快速发展和劳动力的不足，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大量短期甚至长期迁移东部经济发达地区，这种人口流动也称为“民工潮”；另外一类流动则是农民就近流动到快速发展的本地城镇。1984年，中国社科院教授张雨林在《社会学研究通讯》发表的一篇文章中，首次提出“农民工”一词。尔后，“农民工”这个说法被大量地引用。沈立人在《中国农民工》一书中对农民工的定义、诠释和正名作了仔细的梳理，“农民工，无论是‘农民+工’或‘农+民工’，不同程度地兼有两种身份和双重角色，并且以‘农’为起点，以‘工’为归宿，是过渡期的特有现象。”^①随后，“农民工”一词在《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中反复提到。采用农民工称谓，一是既能包括广大进城务工的农民，也能包括就近从农业转移到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民；二是农民工是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的特殊群体，将在一个相当长的转型时期内存在；三是这一称谓在民间和社会媒体中已经约定俗成，比较准确，比较贴切；四是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文件经常使用农民工称谓，不存在一定的群体歧视，关键在于国家实行一定的经济社会政策来解决。2004年中央1号文件明确指出：“进城就业的农民工是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据国家统计局网站2012年4月27日公布2011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进城农民工超过2.5亿，已经成为我国城市产业发展的重要生力军。

从老舍笔下的“骆驼祥子”，到路遥的“高加林”，相隔半个世纪的中国农民不约而同来到城市打拼。但在这些文学中，城市虽然作为乡村的对立面，却没有出现真正实体性的城市书写。城市只是一个相对于乡村世界的虚指。改革开放以来，由于长期受到城乡二元体制的影响，农民工作为农民的一部分，与农民、农村仍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游动于乡村与城市之间。作为一个新的社会分层，他们独特的经济需求和政治诉求远没有得到充分的尊重。他们往往带着农村的青春血液，为自己的生存和梦想走进城市，并用

① 沈立人：《中国农民工》，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05年版，第52页。

文字来阐释自己的城乡焦虑与困惑。都市寻梦的激情与价值失落的伤痛，促使一些人将自己的生存感受和情感体验表达出来，形成了新世纪一个既新且旧的文学风景。安子、王十月、郑小琼、谢湘南、柳冬妩、周崇贤、林坚、张伟明、张守刚等外乡人来到广东各地，打工、写作两不误，用类似于纪录片的方式原生态地表现农民工对城市的追求与梦想。

一些打工青年以自办报纸、杂志的形式，或以内部刊物、文学网站为阵地，将自己的打工见闻、情绪体验表现出来。1992年深圳宝安区石岩街道打工青年自办《加班报》，它的发刊词是：“我们刚刚结束给老板加班，现在我们开始为自己的命运加班。”带动整个珠三角地区“打工文学”热潮的，则是深圳宝安区主办的《大鹏湾》杂志。2001年5月31日，全国第一份民间打工诗歌报《打工诗人》报创刊。其中刊载的一些诗歌相继在《诗刊》、《星星诗刊》、《诗潮》、《诗选刊》、《诗歌月刊》、《绿风》、《扬子江诗刊》、《人民文学》、《新华文摘》等全国多家报刊进行了转载。据不完全统计，自改革开放以来，以发表农民工进城题材为主的期刊主要有：《佛山文艺》、《嘉应文学》、《江门文艺》、《大鹏湾》、《打工族》、《打工妹》、《打工知音》、《西江月》、《南飞燕》等。其中自1991年到2013年，《佛山文艺》登载关于农民进城打工的作品约有1586篇，成为农民工题材创作的第一大刊物。其中1994年变为半月刊，设有“打工文学专号”，主要关注打工者生活状态和城市奋斗的经验，每刊大约有3篇关于农民进城打工的创作。2001年后，新乡土和都市婚恋居多，每期约有5—8篇，体现了打工创作与市场消费的与时俱进，也反映了农民进城题材不断与消费话语的紧密结合，其中的批判性逐渐以大众化的形式存在。

同时，面对如此庞大的农民进城大军，尤其是他们在城市的种种遭遇与压抑，很多精英作家也纷纷侧目。王安忆、迟子建、铁凝、范小青、刘庆邦、王祥夫、鬼子、陈应松、尤凤伟、孙惠芬、荆永鸣等，以关注底层命运为使命，从人性的复杂与社会的批判等层面创作了一系列农民进城的作品。一些主流媒体也给予了关注，《人民文学》、《十月》、《当代》、《天涯》、《钟山》、《花城》等刊物纷纷开辟农民进城打工的栏目，刊载农民工进城题材的作品。《人民文学》自2001年以来，累计发表关于王十月、郑小琼等关于农民工书写的作品有131篇，体现了官方媒体对这一题材的关注。网站主要

有：打工诗歌网、中国打工作家网、打工文学联网、绿洲文学网等。这些文学现象共同形成了一道农民工进城的文学风景。

因此，本书探讨的农民工书写，指的是当下关于农民进城打工的文学创作现象。其中既包括一系列“我手写我口”的打工者的体验性写作，又包括一些主流的作家对农民工生存状态的精英性写作。这是当下作为一个农业大国的社会在工业化进程中的真切反映，体现了文学对时代文化与底层命运的深切关注。

第二节 农民工书写的研究现状与特征

文学是一定社会现实的反映与思考。自 20 世纪 80 年代农民进城谋生成为时代主潮以来，相应题材的文学创作应运而生，尤其在党和国家提出以人为本，重点解决“三农”问题等方针政策后，农民工书写呈现井喷状态。随之，针对这类创作的研究不断推出。2013 年，中国期刊网显示，关于这类创作的研究论文达 1233 篇，其中 1992 年 1 篇，到 2004 年 11 篇，从 2005 年的 44 篇开始呈现不断扩大之势，到 2013 年达 275 篇。从内刊《大鹏湾》，到《佛山文艺》、《江门文艺》，到主流文艺刊物《人民文学》、《小说月报》、《小说选刊》，关于农民工书写的研究成为当下一门显学。同时，国家主流不断通过各种奖励机制推出农民工书写的精品。共青团中央以“鲲鹏文学奖”，“人民文学奖”、“新浪潮奖”等形式，不断推出一批新人和新作。相应地，农民工进城打工的话题不断成为各高校、各研究部门的课题，截至 2013 年，全国高校完成的相应话题的博硕士论文共有 56 篇。正是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构成了当下农民工书写研究的热，也决定了农民工书写研究呈现出以下特征。

一、文学研究的“文化”化

早期农民工书写的关注，主要以深圳和广东的学者和作家为主，他们以文化学、文化社会学的视角，来关注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农民进城打工的文

学现象。杨宏海是较早关注农民工书写的学者之一。他从深圳地域文化或都市文化的研究路径入手,提出了“城市想象”、“身份认同”、“性与政治”、打工小说创作的“造梦”与“造市”等,直接影响了后来的研究命题。他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对“打工文学”进行跟踪研究,先后发表了《打工世界与打工文学》^①、《打工文学”纵横谈》^②、《文化视野中的深圳文学》^③,主编《打工文学备忘录》、《打工文学作品精选集》、《全球化语境下的当代都市文学》等丛书。他与尹昌龙的《市场经济下的文学新潮:打工文学》^④探索了打工文学与“打工”的关系及发达的商品经济的关系,从传播学角度指出了传媒对打工文学发展的促进作用,并对安子、张伟明、周崇贤等代表作家的创作进行了倡导性的评价。毛少莹的《打工文学与下层职业女性》^⑤在描述“打工文学”发生发展过程的同时,以女性学者的细腻和敏感的视角观察“打工妹文学”及“打工妹”的生活现实,宏观地描述了女性农民工在南方的生存现状,提出农民工的性与政治、城市道德与性压抑等文化社会学性质的文学话题。尹昌龙站在深圳都市文化的角度,《大鹏湾的文学生产》研究了打工小说的作者、读者、编者和刊物之间的共生状态,进而考察了打工小说的精英立场与大众立场之间的冲突特征。开创性、先导性是这些广东研究者的主要价值所在,他们的研究立足于打工者的实际创作,从都市文化的视角来看待这些文学现象。由于他们的职业身份和研究习惯,往往从文化产业的视角来关注深圳或广东的打工文学创作现象,其背后的功利性直接影响了研究视野的局限。

其次,“文化”化倾向还体现在农民工书写的底层意识研究。这些研究主要体现在一些精英学者的文章和讨论中。自蔡翔在《钟山》第5期上发表了《底层》^⑥一文以后,刘旭的《底层能否摆脱被表述的命运》^⑦,罗岗的《“主

① 杨宏海:《打工世界与打工文学》,《当代文坛报》1991年第2期。

② 杨宏海:《“打工文学”纵横谈》,《深圳作家报》1991年第2期。

③ 杨宏海:《文化视野中的深圳文学》,《羊城晚报》,副刊《花地》1995年2月4—5日。

④ 杨宏海、尹昌龙:《市场经济下的文学新潮:打工文学》,《广州文艺》1995年第3期。

⑤ 毛少莹:《打工文学与下层职业女性》,《深圳文化研究》2000年第2期。

⑥ 蔡翔:《底层》,《钟山》1996年第5期。

⑦ 刘旭:《底层能否摆脱被表述的命运》,《天涯》2004年第2期。

奴结构”与“底层”发声——从保罗·弗莱雷到鲁迅》^①等文本，将农民工书写纳入“底层”文化的讨论中，体现了研究者作为知识分子关注社会分层，思考文化走向的忧患情怀。“现在的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是对底层的双重的阉割和篡改，没有自己的文化，底层很难正确传达自己的声音。”^②王晓明认为：“‘三农问题’并不仅仅是来自今日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变化，它也同样来自最近二十年的文化变化。这些变化互相激励、紧紧地缠绕成一团，共同加剧了农村、农业和农民的艰难。因此，如果不能真正消除‘三农问题’的那些文化上的诱因，单是在经济或制度上用力气，恐怕是很难把这个如地基塌陷一般巨大的威胁，真正逐出我们的社会的。”^③这些研究往往农民工书写作为分析的个案，将他们的文本作为具体时代的研究材料，更多的是一种社会学或文化社会学层面的思考，而少有文学审美层面的研究。他们的研究较之前者具有明显的理论深度和文化穿透力，却在文学审美与人性分析层面蜻蜓点水，甚至很少驻足。

另外一些学者或立足于社会学视角，通过具体的作品解读，来分析当下社会底层世界艰难复杂的生存状态，并承袭了传统知识分子的启蒙与拯救意识，思考社会分层而造成价值失衡的原因，体现了文学研究的社会学思维，或者从宏观的视野来研究农民工书写与人民性、《人民文学》期刊的关系。李云雷的《近期“三农题材”小说述评》^④、王文初的《新世纪底层写作的三种人文观照》^⑤、贺绍俊的《文学的人民性与社会形态》^⑥、旷新年的《人民文学：未完成的历史建构》^⑦等文章将农民工书写视为一种“新人民性”，表现底层正是体现了一种人民伦理，其中更多地体现了社会学乃至文化学的特质。李云雷则直接从“三农”问题这一社会学概念入手，从“新左翼”文学精神契入农民工的生存事实，分析和思考一些底层写作的审美价值。他甚至强调：

① 罗岗的《“主奴结构”与“底层”发声——从保罗·弗莱雷到鲁迅》，《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5期。

② 蔡翔、刘旭：《底层问题与知识分子的使命》，《天涯》2004年第3期。

③ 王晓明：《L县见闻》，《天涯》2004年第6期。

④ 李云雷：《近期“三农题材”小说述评》，《文艺理论与批评》2004年第6期。

⑤ 王文初：《新世纪底层写作的三种人文观照》，《江西社会科学》2004年11期。

⑥ 贺绍俊：《文学的人民性与社会形态》，《探索与争鸣》2008年第5期。

⑦ 旷新年：《人民文学：未完成的历史建构》，《文艺理论与批评》2005年6期。